

← (上接13版)

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另一则曰：“苟六义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薏藏阁置，以待贞元。”在前一种将文学批评作为消遣遣怀的姿态之外，又分明有“传心”以待久远这样深重的自我期许存焉。同样，在《论再生缘》一书中，陈寅恪既发过“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这样的感叹，也说过“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于一篇之中，能融化贯彻”这样的自评。然而日后，陈寅恪又不止一次地将《论再生缘》这一著述自比为东晋时的史家孙盛的史著《晋阳秋》，和宋末诗人、画家郑思肖(1241—1318)在宋亡之后、以赵宋孤臣之姿写作的诗集《心史》，显然又在昭告世人，“无益之事”之中另有所托。

两位学者在相异的时空中所作的奇妙对话，似乎都投射出了中国一直流传不绝的“心史”或“诗史”的传统。而努力贴近并读懂他们藏在“心史”或“诗史”之中的“诗心”，对于王德威来说自是驾轻就熟。他将《谈艺录》所显现的结构紧张性，诊断为中国文学批评甚至文论“面临现代性考验而衍生的危机”症候：“一方面是宏观整合的文章大业，一方面是支离散漫的短钉之学；一方面极尽展演学问之能事，一方面藉文字、考证隐藏无限心事；一方面赏析，一方面忧患。史识和诗心的连结若断若续，不再体现钱心目中那样水乳交融的关系。”

王德威对《论再生缘》所表征的中国文论不同层次的紧张或危机时刻的分析更见细腻和深切：陈寅恪惊诧于《再生缘》这样体制的韵文叙事，在其中看出了陈端生这一传奇女性的“慧心”：陈端生利用弹词这种不免简单呆板的七字韵文形式，展现了自己非常聪颖的历史观和生命观；在另一种大的语境中，陈寅恪与《再生缘》吟唱情景所包含的一个大的隐喻相认同：弹词的吟唱者往往是盲人，而据说中国历史最原始的记录者或曰讲述人就是所谓的“瞽蒙”。因此，弹词的吟唱情景可以使陈寅恪遥想千百年之前、位于中国历史叙事的开端之处的那个目盲心明之人；盲人的歌吟还包含着另一层文化的含义：原本“礼不下庶人”的文明，曾几何时转变为“礼失求诸野”，要在穿街走巷的弹词吟唱者身上寻找失去的礼乐。在弹词的形式里寄寓如此重大的历史任务，其间产生的紧张性同样令人瞩目；最重要的，陈寅恪赋予陈端生及其笔下的女扮男装为父替夫伸冤的孟丽君极

为重大的思想史的意义：“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藉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这或许就是陈寅恪不惜将陈端生与杜甫、将弹词《再生缘》与西方史诗相提并论，并认为无论哪一组比较，前者较诸后者都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真正原因。因为它太容易让人回想起陈寅恪早年对王国维自沉意义的著名阐发，及其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不遗余力的赞扬。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第二讲也是一次比较文学研究的娴熟实验。王德威引入同一时代的多位西方学者在不同的危机时刻所作的文学或文化论述作为对照，再一次检验中国文论加入世界知识体系的流转对话并做出独特贡献的潜能。提供参照的西方学者主要包括：遭纳粹清洗不得不流亡伊斯坦布尔达11年之久的德国犹太裔学者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他仅凭有限的资料和个人记忆，撰成一部论述西方三千年写实(现实)观念传统的巨著《摹仿论——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1946)。该书在纳粹刻意奉希腊或雅利安文明为唯一正宗的时候，捍卫和展现犹太基督教文明源远流长、惊天动地的魅力；被放逐10年、并因病失去一条腿的俄国学者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在贫无立锥之地的境况下，于莫斯科写出了研究基督教狂欢节文化精神的惊人之作《拉伯雷和他的世界》(1940)；另一位从德国辗转逃亡到美国的犹太人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在麦卡

锡主义统治之下的芝加哥，完成了批判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论著《迫害与写作艺术》(1952)，并在书中指证西方文明中政治与哲人(或知识者)永久的冲突。那么，哲人和知识者如何能使自己信奉的理念或真理流传后世呢？这就说到了“隐微写作”(Esoteric Interpretation)的问题。施特劳斯指出，这是存在于中古时代的西方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文明里的一种写作艺术，即写作者运用各种巧妙的修辞术，如隐喻、曲笔以及各种各样奇怪的论述方式，隐藏自己的心事，留待后世有慧心和灵犀的读者理解会意。王德威指出，“隐微写作”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微言大义”可以相互呼应。

由施特劳斯的“隐微写作”，我们或许可以回到本雅明“危机时刻”的本义。本雅明提到“危机时刻”，是在他的《历史哲学论纲》中：“呈现过去并不是将过去追本还原，而是执着于记忆某一危险时刻的爆发点。历史唯物论所呈现的过去，即过去在历史一个危险时间点的意外呈现。”顾名思义，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集中想要表达的是他的历史哲学或曰历史观，而历史观自然要触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解和把握。本雅明的首要目标，是反对构成当时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基础的一种“进步”观念，因为他惊悚地发现，正是这种“进步”观念，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原因之一在于，“在进步的名义下”，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们“把它(法西斯主义)看成一种历史的常态”。本雅明同时还发现，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反对者们失去应有的警觉和危机意识，从而把本应视作“非常情况”的“紧急状态”，当成理所当然的“惯常

情况”的“进步”观念，是“与人类穿越匀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进程”的概念密不可分，因而，对后一种“匀质的、空洞的时间”概念的批判，必须成为对前一种“进步”观念批判的基础。

可以明显看出，本雅明想要批判的“进步”观念，也就是相信人类能够“无限趋于完美”、历史“不可抗拒”地“自动循着一条直线或螺旋线前进”的现代乐观主义的永恒进步观，而处于这种进步观念的核心位置的，则是“匀质的、空洞的”的现代时间概念。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就立足于这样的批判目的之上。

本雅明认为，历史的结构“不是建筑在匀质的、空洞的时间之上，而是建筑在充满着‘当下’(Jetztzeit)的时间之上”。什么是“充满着当下的时间”？本雅明举例说，“对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1759—1794)来说，古罗马是一个他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的、填充着当下时间的过去”，因为“法国大革命的领袖们把法国大革命看做古罗马再世”。本雅明还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没有这个‘当下’的概念。在这个当下里，时间是静止而停顿的。”

显然，本雅明所理解的过去、当下以及由当下所定义的现在，都不再是处于一条持续前进的时间直线之上的一个个匀质的、空洞的点，因而，他的历史哲学也就与以匀质、空洞的时间观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拉开了距离。事实上，爆破建筑在历史主义时间观之上的“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正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主动承担的任务。

“爆破”常常酝酿于“危机时刻”。通过革命性的爆破，原

本被压迫的过去就在“当下”的现在获得了赎救。因为历史的过去是很难“按它本来的样子”被追本还原的，它只能作为一种记忆，作为“在危急时刻被历史单另挑选出来的过去的形象”，“呈现在那个”同样“在危险的关头被历史选中的人的面前”，并被后者“捕获”。这种发生在“危机时刻”的双重挑选，其实是充满阐释学精神的。而对于被选中的过去来说，历史主义给出的只是过去的“外部”形象，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能“为这个过去提供”“独特的体验”。

“爆破”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历史的独特方法：“把一个特定的时代从连续统一的历史过程中爆破出来；把一个特定的人的生平事迹从一个时代中爆破出来；把一件特定的事情从他的整个生平事迹中爆破出来。这一方法的结果是，这一特定的事情同时既保存着又删除去这个人整个的生平事迹；这个人的生平事迹同时既保存着又删削去这一特定时代；这一时代同时既保存着又删削去整个历史过程。”

或许，这种连续“爆破”同时“既保存又删除”的双重选择，可以解释暮年陈寅恪与陈端生的《再生缘》出人意料的相遇。所谓“隐微写作”，可能就是在历史的“危机时刻”，那个被选中的人，面对被他和历史单另挑选出来的过去，捕捉和阐发对他而言别有深意的记忆和形象。而包含在这一研究方法里的本雅明的非匀质空洞的时间概念，又与钱锺书对文学批评或比较文学“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的立体感悟，出奇地异曲同工。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黄天华谈写作《中国财政制度史》感慨

高校难以资助十年以上的项目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黄天华呕心沥血30年著就的《中国财政制度史》，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旗下格致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该书出版座谈会上，黄天华谈写作的心路历程时感慨，掌握一个国家的财政经济史研究话语权非常重要和必须，但是遗憾的是现有的经济史学研究环境不佳，高校难以资助十年、八年的长期项目，遑论三十载。

黄天华说，过去中国财政史的大部分完整的文献、史集

资料并不在中国，而是在日本、法国、美国等国家；加之近年来经济史、财经史被冷落、被边缘化，研究历程的苦涩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经济理论研究只有长期的投入，几乎谈不上收益。而高校不可能资助一个十年、八年的项目，更不可能设立一个长达几十年的项目。如果研究者执着于此，那么期间所有的风险必须要自己承担。

黄天华说：“中国财政制度史纵向跨度上下五千年，横向涉及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

字学、考古学等几十门学科，其深度和广度不是一个人能够解决的。命运只给了我30年的时间。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对完成这样一部著作过于乐观。1986年正式动笔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到2012年时我已经是各种疾病缠身，突发性的心脏病、肺气空洞、胃出血，一次又一次地把我推向了地狱的门口。医生跟我说你心脏病突发起来救你的时间只有20分钟，因此我就要搁笔了。同时我也不想再拖累我的家庭

和我的孩子，我知道我所剩下的时间可能不多了。为此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压缩我原来拟定的较为完整的研究大纲。这本书原来可以写得比较好一点，但是后期我实在没有能力了，尤其是最后两章，我几乎砍去了近一半。我心里很痛，但是我没有能力再继续把这篇文章进行下去。”

黄天华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在一定的时间内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他希望当前的科研体制不断改革，能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研究氛围，最大限度地调动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本报记者 陈韶旭)